

# 这样的分析、批判对吗？

——评《哲学史上的先验论》对孟子的介绍

新建

**【编者按】**新建同志对《哲学史上的先验论》一书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值得欢迎的。这对我校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继续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个促进。我们决心和广大工农兵一起，认真看书学习，狠批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孔孟之道，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编写的《哲学史上的先验论》(下简称《哲学史》)，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版，一九七三年一月重印。据“出版说明”介绍，这本书“通过中外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九个唯心论哲学家，扼要地介绍了先验论的种种表现形式，并且略加分析、批判。”

介绍先验论，本应追溯它的政治基础和阶级根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分析研究，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然而，《哲学史》一书中对历代剥削阶级的“亚圣”，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孟轲的反动学说是怎样“分析、批判”的呢？

《哲学史》在《孟子》一章中，把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吹捧成“战国时期封建贵族的思想家”，他“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主张封建化”。在编者的笔下，奴隶主贵族的忠实走狗，奴隶制度的反动卫道士孟轲竟成了顺乎潮流，支持社会变革的“革新派”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在大多数诸侯国已基本完成，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封建贵族即新兴的地主阶级业已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但是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疯狂地向革命阶级反扑。他们在楚国射杀吴起，在秦国车裂商鞅。当时中原各诸侯国中复辟反复辟，倒退反倒退的斗争异常激烈。在这股反动逆流中，孟轲赤膊上阵，奔走呼号，充当复辟倒退的急先锋。他对奴隶制度的土崩瓦解痛心疾首，如丧考妣。大声疾呼要“法先王”“保世臣”，妄图复兴奴隶制，重建奴隶主阶级言出法随，语出令行的世袭特权。他四处鼓吹“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的谬论，禁锢新兴地主阶级的造反精神，孟轲“言必称尧舜”，大肆贩卖“无礼义则上下乱”的黑货，丧心病狂地攻击新社会。他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大夫又不如诸侯(《孟子·告子下》)。企图用奴隶社会的“古之制”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今之道”。为了挽救奴隶主贵族的垂死命运，复兴西周奴隶制“盛世”，孟轲带着弟子，风尘仆仆，周游各诸侯国进行反动说教。由于他的主张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处处碰壁。孟轲寄希望最大的是齐宣王，尽管他费了不少口舌，无奈“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最后只得灰溜溜地离开齐国。劳动人民当时辛辣地讽刺他是

个“守旧术不识世务者”。《哲学史》对这些铁的史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要把“封建贵族思想家”的冠冕戴在孟轲复古守旧的花岗岩脑袋上，公然断定他“主张封建化”。我们不禁要问，作出这种结论究竟有何根据？

孟轲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竭力鼓吹“仁政”的反动谬论。他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一言以蔽之，孟轲所津津乐道的“仁政”，揭穿了，不过是要“正经界”“复井田”，把社会重新拉回到奴隶制去。他恶毒咒骂秦孝公、商鞅是“暴君”“污吏”，杀气腾腾地叫嚣要对“辟草莱者”处刑。妄图用反革命暴力残酷镇压那些实行“耕战”政策的革新派。这就充分证明，孟轲鼓吹“仁政”是假，开历史倒车是真。而《哲学史》对孟轲这种虚伪反动的说教肆意加以美化，说什么“他的这种‘理想’，就是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供贵族们剥削，并用封建思想统治他们，使他们不得有造反的念头，以建立和巩固封建农奴制的统治秩序”。所谓农奴制，就是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正如列宁指出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由此就有农奴制这一概念。”（《论国家》）封建农奴制取代奴隶制尽管也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社会制度是革命的，进步的。《哲学史》把孟轲鼓吹“仁政”的反动理论说成是要“建立和巩固封建农奴制的统治秩序”，这就完全抹煞了他妄图通过恢复奴隶社会的“井田制”重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实质。按照这种说法，露骨地叫嚣要对“废井田”者施“极刑”的反动儒生，岂不成了主张“开阡陌封疆”，维护先进生产关系的革新人士了吗？

更有甚者，《哲学史》公开为孟轲的“天赋道德观”涂脂抹粉，居然给这套反动说教涂上一层“进步”的色彩，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反杜林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属于思想范畴的道德观念，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孟轲“仁义”的反动道德观，也是有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他把“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说成是天生的道德，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因此，只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完全是剥削阶级吃人的理论。孟轲编造这些骗人的鬼话，无非是要奴隶们俯首帖耳地跪倒在奴隶主贵族面前，逆来顺受，不要起来革命。其罪恶目的昭然若揭。为了挽救奴隶主贵族的氏族统治日益分崩离析的颓势，孟轲还声嘶力竭地宣扬“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告诫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叛逆者”不要“犯上作乱”，以加强氏族内相互间的团结，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孟轲这个奴隶主贵族的忠实卫道士，对“文武周公”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开倒车的祖师爷孔老二也是大加吹捧，口口声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与此相反的是，他对那些主张革新的人和奴隶主贵族内部的不坚定分子却深恶痛绝。出生在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的墨子和杨朱，怀着对现实悲观失望的心情，抛出“为我论”和“兼爱说”。孟轲得知后竟大发雷霆。认为杨朱态度消极，只顾保全自己，不去挽救奴隶主贵族的危亡；而墨子讲“兼爱”，有损于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道德观念。因此，他破口大骂杨朱的“为我”是“无君”；墨子的“兼爱”是“无父”。由此可见，孟轲的道德观是何等鲜明。这一切都足以说

明，孟轲的“仁义”道德，是地地道道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道德，是为开倒车鸣锣开道的复辟理论。《哲学史》避开这些历史事实，侈谈什么“孟子这一套道德说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它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观念和要求，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好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没落奴隶主贵族复辟倒退的精神支柱，竟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社会的思想武器。编者在这里一笔勾销了孟轲反动道德观的阶级实质。实在是荒唐得很。

《哲学史》告诉读者，这本书“不象一般历史书籍那样系统地、全面地去讲解历史，而是为了配合学习，简明扼要地、有所侧重地提供一些历史知识。”的确，书中对孟轲“分析、批判”的字数并不多，然而寥寥数语却向读者介绍了一个被美化的孟轲，提供了一段被歪曲的历史。列宁曾经指出：“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论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哲学上的两军对战，归根到底都紧密联系着当时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对于历史上任何人物和思潮、流派的分析评价，都必须依据当时的阶级斗争，考察它究竟站在哪个阶级一边，属于哪一条路线，是否有利于先进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哲学史》不去分析孟轲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阶级根源，不去考察他的阶级地位和政治立场，而是抓住一鳞半爪的材料，毫无根据地作出结论。这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正因如此，《哲学史》在《孟子》一章中是非不明，界限不清，对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吹鼓手孟轲竭尽美化吹捧之能事。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哲学史的人竟然歪曲历史，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假孟轲。这岂非咄咄怪事？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二千多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力吹捧和肆意歪曲，完全掩盖了孟轲的真实面目。我们倘若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努力加以识别和批判，就必然会导致在认识上产生剥削阶级的偏见。《哲学史》对孟轲的美化、吹捧，并非是历史知识不足，而是在于未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去指导分析研究工作，因而站错了立场，轻率地作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结论。这种现象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当前，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出版战线同其它各条战线一样，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只有不间断地开展这种批评，才能彻底根除封、资、修的反动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我们对《哲学史》一书提出意见，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同时，我们也诚恳希望广大工农兵能和我们一道来研究这个问题。有不当之处，请给予批评指正。